



让千年鲤鱼灯“游”出新天地

——大足区万古镇推动非遗活态传承的改革实践



油菜花海里的鲤鱼灯舞。(资料图)

2025年除夕,重庆。两江交汇处,春晚分会场的舞台灯火通明。70条鲤鱼灯在夜空中翻腾,鼓点落下,鱼群聚拢又散开,像是从江水里跃出来的。

69岁的何定模站在台侧,盯着那些鱼灯在演员手中起伏。钢丝骨架纹丝不动,覆膜金布在灯光下泛着细碎的珠光。他数着节拍,直到最后一个动作收束,才松开攥紧的手。

为了这一刻,他等了二十年。2005年,镇上经营鲤鱼灯舞演出的小公司解散,原先的舞灯队伍也随之散伙。政府临时通知有演出,何定模打了十几个电话,只凑到五六个人。就是从那一天起,他知道,再不做点什么,这条游了1200多年的“鱼”,怕是要搁浅了。

彼时,同样的问题也摆在万古镇政府面前:这门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,到底还值不值得保?如果要保,怎么保?一场民间与政府的合力破题,就此展开。

破题一:灯能不能做出来?

万古镇鲤鱼灯舞的源头,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。宝顶山石刻香火最盛时,百姓手持纱灯朝山进香,不知从何时起,纱灯扎成了鲤鱼形状。到了清代,“鲤鱼跃龙门”已是当地庙会上的保留剧目,逢年过节、寿宴婚嫁,万古人都要舞一回。

何定模就是那些舞灯的万古人之一。他在供销社上班,和镇上很多人一样,爱看鲤鱼灯,爱舞鲤鱼灯。2005年舞灯队伍散伙后,因为人熟,政府有民俗演出总叫他来张罗。一来二去,他成了“活动联络人”。后来,他决定自己拉队伍,成立鲤鱼灯舞民间艺术团。没有钱,入团的人每人交100块钱。没有场地,排练去镇政府借院子。50多个人凑起来了,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本地人,但在这支新拉起来的队伍里,能从头到尾做出一条完整鱼灯的,一个都没有。

这是改革面对的第一道坎:工艺在断代。何定模只能自己上手。他拆开老师傅的旧灯,一点一点试。竹篾太娇气,演出磕碰就断。一次演出要20条鱼灯,他备了25条,彩排第一天坏了6条,蹲在后台用胶布缠竹篾,缠得满手血印子。他想到用钢丝,几个老师傅直摇头。何定模没听。细钢丝做主支撑,编织带加固,外面照糊绸布,摔都摔不坏。老式鱼头扁平,嘴巴短小,像泥鳅。他花了11年改了三版,专门去河边看活鲤鱼,回来对着灯改,直到鱼头翘起、嘴唇加厚、腮部鼓出。金粉手绘换成覆膜金布,广告颜料换成防水固色的

快色素。这些改动彻底改变了鱼灯的活法:以前得小心供着,现在能舞进风雨里。

民间的破题紧锣密鼓,政府的破题也在同步推进。早在1999年,万古镇就启动了鲤鱼灯舞的首次非遗申报,2003年成功入选重庆市市级非遗,2008年大足获评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。名头之外,真金白银的投入更实在:镇里投200万元建起保护传习所,集道具制作、展示体验、传承研学于一体,后来成为重庆市首批市级非遗传习所;又投2000万元建起70亩的鲤鱼灯舞文化体育公园,既做排练场,也向市民开放。万国路沿线上了大幅景观喷绘,三元村的“美丽乡村”改造嵌入了鱼灯元素。政府还在区级层面推动知识产权保护,帮团队申报了4项国家专利、4枚注册商标,把制作工艺和表演动作的规范固定下来。

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:阵地建起来了,人却接不上。一条鲤鱼灯,200多道工序,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何定模一个人能从头做到尾。直到2022年,转机出现了。

那年,李云芬在万古镇看了一场鱼灯表演,跑来说要学。何定模起初没当回事——这些年说要学的人多了,没一个坚持下来。但李云芬不一样。她上世纪90年代在广东一家外资制品厂做打版师,老板画的图纸只有大概图样,没有尺寸比例。哪里加加减减、弯曲度多少,全靠自己一遍遍试到合格。几年下来,她练成了一个本事:拿到模糊的方向,做出精准的成品。

她把这种本事带到了鱼灯上。传统鱼灯有一种绿,舞台灯光下很艳,自然光下却沉闷老旧。李云芬不满意,开始自己一遍遍试。“每次都会有新发现,最后终究会做出完美的成品。”她调出的新配色,舞台上光彩不减,日光下也明亮生动。何定模把配色这一关交给她,不再插手。“她来了,我觉得后继有人了。”

与此同时,政府推动的校园传承也在铺开。大足三小、万古镇中学等6所学校将鲤鱼灯舞纳入体育课程,培育了3个教学团队、200余名学生传承人。大足三小组建了两支学生表演队,万古镇中心幼儿园的“群鲤戏园”获评重庆市“非遗进校园”优秀案例。政府每年的非遗专项资金,相当一部分投向了这些校园项目,试图从娃娃抓起,破解传承断层的难题。

破题二:故事能不能讲好?

灯做出来了。但怎么演,是改革的第二道坎。

传统的舞法有动作没剧目,音乐是川剧锣鼓老调子,年轻人不买账。表演者平均年龄超过60岁,一位老艺人私下说:“不敢安排高强度演出,摔一跤就骨折了。”台上下台,在一起老去。

何定模开始破这个题。他把自己几十年舞灯的经验提炼成一套“四到”心法:眼到、手到、脚到、心到。眼盯鱼灯保安全,手腕发力摆鱼身,弓箭步马步台步是基础,心神要沉浸模拟游鱼。这套心法让口传心授第一次有了标准化的教学体系。在政府推动下,团队后

来申报了八大标准表演动作专利。

但何定模知道还不够。他要给鱼灯“讲故事”。这一步,政府搭了关键的一座桥。2019年,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,经大足区政府和文旅部门长达数月的协调争取,万古镇鲤鱼灯从众多非遗项目中脱颖而出,拿到了进京展演入场券。70条鱼灯登台,全部由本地年轻人出演,何定模带队在北京封闭排练了一个月。那次进京让他看到了专业编导和舞台调度能带来什么。回来后,区文化馆主动介入,牵线重庆舞蹈学院,开始做一件更大的事。

他们编排了沉浸式舞蹈剧场《守·鲤》,展现传承人的情脉与时代困境。2023年,区文化馆又联合重庆舞蹈学院创编了《手鱼》,何定模负责传授基础动作,专业编导负责故事线和舞台调度,剧目有了完整的起承转合。后来又有《鲤鱼跃龙门》,用现代编舞讲古老传说。音乐也在变:川剧锣鼓“三起三落”的老程式还在,但融进了电子节拍,创作出《鲤鱼寻宝》《鲤鱼闹春》等新作品。

更大的舞台随之而来。2025年,春晚首次在重庆设立分会场,从区文旅委到镇文化站,层层对接了大半年,万古镇鱼灯终于在两江交汇的山水实景中亮相。随后又登上元宵晚会,《非遗里的中国》《艺览天下》《记住乡愁》等栏目接连找来。在政府推动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框架下,“成渝地·巴蜀情”文化交流成了固定平台,万古镇鱼灯与中敖火龙联袂登台——一柔一刚,一鱼一龙,被业内称为“双非遗”融合的典范。从大理舞蹈季到景德镇庙会,从海南欢乐节到贵州“村超”,团队三年跨区域展演超过50场。

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,靠传承人的标准化提炼、政府的平台搭建和专业编导的合力介入,闯出了新路。

破题三:路能不能走宽?

手艺有了,剧目新了。但最根本的改革难题,是市场。

何欣雨第一次登台是2024年春天,宝顶架香庙会。她是何定模的孙女,2023年暑假被爷爷拉去传习所帮忙,一上手就放不下了。“鲤鱼灯放在那里不起眼,是死物,演起来瞬间就变活了。”

然而这个21岁的姑娘心里清楚,光靠登台演出,这门手艺走不远。更大的问题是,团队没有对公账户,开不了发票,外地单位想采购或邀演,一听不能公对公就算了。何定模也急:“铜梁龙的产业已经成熟了,有门店有稳定收入,我们太单薄。”

“应该走文创的路。”何欣雨有自己的判断,“把鲤鱼灯做小,让更多人可以把玩,发展周边产品。受到更多人喜欢,才能做大做强。”

她的想法,与大足区正在推动的改革方向不谋而合。2024年,在万古镇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,团队迈出关键一步:民间艺术团升级为文化传媒公司,拿到对公账户和开票资质,彻底打通了市场化运营的通道。有了公司化平台,镇里协助建起道具制作基地和非遗工坊,带动10余户农户参与,20多款文创产品陆续面世:鱼灯造型的工艺品、文具、数字藏品。30厘米和40厘米的迷你鱼灯,卖得最好。早在2016年何定模就做过的缩小版鱼灯,如今有了市场化的销路。

研学也起来了。在区文旅委和旅行社的系统对接下,清华大学、西南政法大学等高校的团队来了40多批,学子们在传习所里学做简易鱼头鱼尾,舞一段基础动作。“非遗+旅游”线路带动大足非遗主题旅游人次增长25%。

商业演出也有了起色。团队年均策划演出80场,加上道具销售和研学收费,全年有了稳定收入。近两年新增30名学徒,平均年龄37岁。常驻演员50人,超百人舞灯队伍,4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、9名区级代表性传承人——“老中青”三代谱系,终于搭起来了。

尾 声

何定模现在最常待的地方还是传习所。墙上挂着两张照片。一张是1957年,周树人老匠人和周恩来、朱德的合影,已经泛黄。一张是2019年天安门演出,70条金黄色鱼灯在广场翻腾。

但何定模知道还没完。传习所每年有一两万学生来体验,真正留下来的极少。“大多数孩子就是来玩两天,做个简易鱼头鱼尾就走了。”他把希望寄托在李云芬这样的中年人身上,也寄托在何欣雨这样的年轻人身上。中年人沉得住气,年轻人有新的眼光。

政府的布局也在继续。2025年,万古镇鲤鱼灯舞被写入大足区政府工作报告,明确为第六批国家级非遗首选培育对象。这意味着政策和资金的通道将进一步打开,从区级到市级乃至国家层面的支持,将为这项千年技艺注入新的动力。

天色暗下来,传习所亮起灯。架子上几十条鱼灯静静悬着,金红色的鱼鳞一闪一闪,像浮在水面上,等着下一刻摆尾游开。

大足融媒全媒体记者 余佳